

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

程朝云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探讨抗战初期,部分战区人口因受战争影响,不得不从东部向西南、西北等战时大后方迁移的几个具体问题。这里所说的难民,是指除随政府机关、学校、厂矿等有组织地内迁的人口以外的所有战时迁移人口。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可以南京沦陷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难民内迁的路线表现出头绪繁多、缺乏较为清晰的主线的特点,近距离的迁徙比较普遍。到第二阶段,内迁难民群体在数量上大为扩大了,其迁移路径也逐渐从无序中凸现有序,西迁成为难民内迁的主流,武汉成为此期内迁难民的主要集中地,以它为中心,内迁的难民再往川陕云贵湘鄂赣及两广等后方地区疏散。

关键词 抗战初期 难民 内迁

本文所说的抗日战争初期,是指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直至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的时期,也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在此期间,随着日本军队侵略的节节深入,华北、华东以至华中、华南的部分地区相继沦为战区,无数中国平民丧身于敌人铁蹄之下,更多的普通百姓家园被毁。他们为躲避战火、或因不愿做顺民而被迫迁徙他乡,沦为难民。关于抗战时期难民的情况,近年来学术界已有所关注,陆续有论著发表,本文即是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抗战初期难民内迁,即其向战略后方地区迁徙的几个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

首先,关于战时难民的身份界定、人员构成及抗战初期内迁难民人数的估计。

我认为:“难民”首先应当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离家外迁;(二)所以离家外迁,非出自愿,而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的选择;(三)其迁徙是自发的,而非有组织的行为;(四)在其迁徙的终点,并无预先的就业安排。后两条之所以重要,可以平津高校的一些教授为例。虽然他们也多是个体迁徙,旅途当中也不免困顿窘迫,但其所在高校的内迁,本身属于一种有组织的行为,而在其迁徙的目的地,他们的职位也已是确定了的,因而不会流落异所而生活全无着落,所以不应将其纳入难民行列。按这几个条件,战时难民概括地说是涵盖了除随政府机关、学校、厂矿等有组织地迁徙的人口以外的所有战时迁移人口。当然这仍然是狭义的理解,因为在抗战的大环境下,任何阶层、任何人的命运都与战争息息相关,即使这些随政府机关、学校、厂矿等迁移的人口,其迁移也同样不免有被迫离家别业、远徙异乡的特点,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也可算是难民。但为了将难民内迁与有组织的政府、学校、厂矿内迁区别开来,还是应对难民身份做以上的限定。本文除特别注明,正是在狭义的范围内使用“难民”这一概念的。

战时难民的具体人员构成又是如何?孙艳魁的《苦难的人流》一书主要是按职业区分将其概括为:(一)工人、农民;(二)学生和知识分子;(三)地主、小工商业主;(四)城市市民和手工业者;(五)沦陷区域的政府工作人员、军警人员及其家属;(六)社会其他

人员。但我们注意到当时的人们还有着更为现实的基于经济的、财产的乃至社会地位的层次划分,如所谓高等难民、知识难民、真正难民,等等。所谓高等难民,就是“原有相当的事业和财产,因敌人的立足,带了一部分财产逃入后方的。”而知识难民顾名思义主要指流亡的知识分子;那些“住在难民收容所里,生活根本发生问题的”则构成了“真正难民”。这样的划分从社会职业构成的角度看有点含糊,但它同样揭示出战争祸患波及中国社会之广之深,几乎各阶层都有人被迫踏上流亡之旅。

战前的中国仍然是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即使较为发达的江苏,其经济来源也是“农占十之八,工仅占十之二”,所以在总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最高,而农村的贫困是不争的事实,一旦遇到战乱,这些农民极易被抛入庞大的难民群中,成为其主要构成成份之一。这种状况可以从1938年初对当时设在安徽青阳的一个难民收容所所做的职业调查中反映出来。在这家收容所中,共有难民159人,其中,农民67人,约占42.1%;工人45人,约占29.3%;商人36人,约占22.6%;学生11人,约占6%。这几个数字虽然并不全面,但从中基本上可以看出抗战初期难民整体的职业构成情况。

然而,内迁难民的职业构成与难民整体的情况并不一样。因为所谓内迁难民,是特指向战略后方地区亦即大后方迁徙的难民,他们只是全体难民中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从难民的绝对量来看,仍然以农民占绝对多数,但因为条件限制,流亡到大后方的难民中

孙艳魁:《苦难的人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难民工作》,《新华日报》1938年2月3日,第4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116全宗65案卷。(以下所引档案未见特殊注明者皆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新华日报》,1938年4月25日,第2版。

农民并不占多数,而以工商业者、知识界人士、工人等占大多数”。原因是这些在难民总体当中占绝对多数的农民,在经济上极为困窘,而精神上又惯于依着于土地,大多不愿或无力长距离迁徙,一般只往邻近地区作短期奔逃,战事稍靖即又返乡。所以抗战初期在武汉长沙等城市的难民,“农民成分不到十分之一二,十分之八九皆由城市中来”。这就使内迁难民的职业构成出现一个迥异于整体的状况。“据某处非正式的统计,自东战场逃来的难民,文化教育者占百分之五十五,党政及国营事业者占百分之二十一,商人占百分之十,工人占百分之六,而农民只占百分之二。”不过,这其中又有些地区的差异,如“闻在西安者农民比较多,其所来地点,多为黄河以北”。

下面有两份分别出自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陕西分会和救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全州总站的调查表,从中可以看出,工商业者占有较高的比例,农民并不占绝对多数。必须提及的是,这里反映的是受救济的难民的职业构成情况;还有为数不少的自费逃难的难民,虽然缺乏有关他们的详细资料,但在当时有能力自费逃难的,一般都有一定的资产,属于“高等难民”或者“知识难民”中的上层,无论在经济的、社会的地位方面,都非普通的农工商阶层可比。

至于难民的年龄构成,目前还缺乏较为详实的统计资料。但从上述两表的情况看,老者所占比例极小,在表一中是占 15.8%,在表二中则只占 7.8%;而无论在表一还是在表二中,少壮年都占有极高的比重,分别为 42.2% 和 63.2%;幼童的比例,在表一中是

孙艳魁:《苦难的人流》,第 77 页。

王卓然:《难民救济问题》下,《大公报》1938 年 3 月 25 日,第 3 版。

《许委员长谈救济问题》,《新华日报》1938 年 5 月 22 日第 2 版。

王卓然:《难民救济问题》下,《大公报》1938 年 3 月 25 日,第 3 版。

42%，在表二中占 29%。这与孙艳魁所说“难民群的年龄结构是一种年轻型的人口”是基本吻合的。

表一 调查难民职业年龄表(1938年6月)

职业	商界	农	工	政	师资	警	自由职业	军	学 生			合计
									大学生	中学生	小学生	
人数	263	151	91	42	31	20	11	6	4	35	20	674
年龄	老者	壮者	幼者	合 计								
人数	509	1359	1350	3218								

资料来源: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16 全宗 274 卷“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陕西分会工作摘要”, 表中职业与年龄统计数字为两种调查的结果。

表二 振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全州总站难民调查表(1938年12月)

职业	农	工	商	学	无业	其他	总计
人数	89	102	110	98	212	57	668
年龄	老年	少壮	幼童				
人数	52	422	194				

资料来源: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18 全宗 66 案卷 41 分卷“振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全州总站难民调查表”改制而成。其中: 1 至 15 岁为幼童, 16 至 45 岁为少壮, 46 岁以上为老年。

抗战初期内迁难民的数量到底有多少?

抗战初期, 难民群体在数量上是颇为巨大的, 而内迁难民为数也很多。然而, 其具体数量是多少, 目前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数字, 即

使是整个抗战时期的内迁难民数,由于缺乏确切的统计资料,我们所能得到的也只是大致的估计数字,一般认为是不超过1000万人口。如陈达按城市总人口中有25%、农村总人口中有5%的人口迁出这个比例计算,总计战时迁移人口约在1400万人左右(350万城市人口加上1075万农村人口)。而陈彩章也认为内迁人口之总计没有统计,“由东南及中部迁至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省或在千万人左右”。他们两人给出的是战时内迁人口数,其中自然包括了并非难民的其他迁移人口,比如跟随机关团体、学校和工厂内迁的人口,虽然这些人口的数量并不高,难民还是占内迁人口中的绝对多数,但由此看来,战时内迁难民数较之内迁总人口数只会更低,也即应低于上面的两个数字。吴相湘根据振济委员会的资料得出的估计数大致印证了这一点:振济委员会所设的难民运配总站“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八日至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底,配运难民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九十四人……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至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底,各省分会救济的难民人数是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三十人……这都是在振济会登记领了救济费的人,还有很多人是自费逃难,人数至少是和上述两项数字相等”。即战时内迁难民总数当在900万人左右。对难民问题作过深入研究的孙艳魁,在综合考察了几个估计数字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不十分准确的估算数字”;也是在800万至1000万人之间,“约占抗战时期难民总数的1/8至1/6”。而抗战初期有人估计自抗战爆发至1938年3月之前逃往战线后方的难民大约在2000万人以上,

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

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12页。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614-615页。

孙艳魁:《苦难的人流》,第266页。

但“此二千万人之脱离虎口逃到后方者不到十分之一，而此十分之一幸到武汉或南昌、长沙、沙市、宜昌、重庆或其他城市者，约计有十万人（只算无办法之难民，公务员与商人不计）”。这里所说的2000万人显然包括了短期就近逃难的人口，基本上是指总的难民数。由于涵盖的时间较短，牵涉的地域也不广，再加上不可能有准确的统计资料，这一数字以及内迁难民数与难民总数之间的比例为“十分之一”的估计看来都有所偏低。不过以此为参照，可以看出孙艳魁的估计大致还是可以接受的。

抗战初期的内迁难民数当然不能与整个战时的内迁难民数相等。然而，考虑到这几个因素：第一，这一时期是日军侵华战线基本铺开、攻势最凌厉的时期，除后方各省外，几乎有半个中国沦为战区，包括了中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华东、华中地区，所以这一时期在抗战史上是产生难民最多，内迁征途上难民最为拥挤的时期；第二，这一时期总体的战争局势尚未稳定，大多数难民还只是奔波在漫长的内迁途中，真正内迁到后方稳定下来的还不是很多，所以在一些档案资料中，自抗战爆发到1938年9月份，武汉市经办难民人数才不过190998人，而陕西方面公布的收容难民人数也不过90多万人，但这并不表示此期内迁的难民很少。事实上，由于内迁的路线太长，途中常因各种难以逆料的原因停留转折耽搁，很多这一时期出发的难民要到1939年，甚至可能更晚的时候才能到达内迁的终点。吴相湘曾估计，到1939年底内迁难民的数量为900万左右。因此，我认为，这也可以大体上作为抗战初期内迁难民总数的估计。

王卓然：《难民救济问题》上，《大公报》1938年3月23日，第5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116全宗274案卷。

《救济灾民难民》，《新华日报》1938年7月29日，第1版。

二

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可以南京沦陷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1937年底南京沦陷为难民内迁的第一阶段。

如前所述,战时难民之所以成为难民,直接或间接地,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果。日军炮火所及之处,民不聊生,只得弃家外出。所以战时难民的产生同战争态势关系非常密切,凡战事进行地区也就成了产生难民的区域。在1937年下半年,日军的侵略集中在华北和华东的京沪杭一带。在第一阶段中,难民也就主要产生于以上这些地区。

战时难民与战争之间的特殊联系,使难民的迁徙运动几乎伴随着战争同步开始。战争开始时,由于大多数人对于战争的长期性尚缺乏认识,所以难民的迁移就形成了一个特点,即一般都是就近迁徙;长距离的迁移虽然也有,但人数较少,主要是城市人口,且知识分子所占比例较高。其迁移的路径,概而言之,大约有以下几种:(一)乡村人口向邻近的山区或其他偏僻地区作短期奔逃,这种路径在时间上、路程上都是极短的,占农村人口绝大部分的贫苦农民一般都采此路径;(二)乡村人口向附近的城市迁移,华北农村人口逃往平、津二市,上海周边居民汇集租界等即属于这种情况;(三)城市人口往乡村或小城镇避难,淞沪会战中,旅沪人口返回原籍即为一例;(四)更长距离的迁徙,包括华北难民或经海路南下上海、南京,或经平汉线至武汉三镇等地,以及上海、南京一带人士西迁等。

下面兹分华北、华东两区说明难民迁徙的具体路径与大致去

向。

华北地区的难民主要由三路向当时的后方迁移。

(一)经平汉路至郑州,再由郑州或者安置于河南境内、或者经陇海路西去陕西、或者继续沿平汉线南下湖北省境。郑州是这一路线的中心,“每日前方逃来难民不下三千”,仅来自河北省的难民,“麇集汴郑,已逾五万”,成为难民的集散之地。其拥挤情状从吴宓描述该地的平汉车站中可见一斑,“时小雨迷濛。车站月台上,人多如山,拥挤充塞,喧哗纷扰,盖皆难民及流氓,以及各路旅客”。对于这些拥挤在郑的难民,国民政府行政院振务委员会所选派之平汉路难民救济专员作了不少安置和遣散工作,从他的报告和电文中,基本上可看出这些难民的大致去向。他们中一部分被送往豫陕境内,“郑县难民招待所截至本月十一日止共收难民一万三千六百余人,输送新乡、许昌、漯河等处约三千余人,输送洛阳、潼关、西安等处五千余人,其自动投亲友者约计三千余人”。另外有一部分难民则去往湖北的信阳、汉口、郾城等地,“接洽得悉郑县难民招待所遣送难民七百余人经汉口商会红十字会安置于贫民工厂……经由郑县送往(信阳)难民一千五百人,除已遣送淠川、罗山安插千余人外,尚有一百人未遣……因郾城交通甚便,难民逃往者颇多”。

(二)经平绥路西迁。一部分往大同、包头;一部分再由大同沿

行政院振务委员会平汉路难民救济专员办公处会议记录,1937年9月29日,116全宗68案卷。

开封河北省战区难民救济协进会致赈委会1937年11月电,116全宗68案卷。

吴宓1937年11月16日日记,见《吴宓日记》第6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4页。

平汉路难民招待所工作报告,1937年10月,116全宗68案卷。

杨名声致赈委会1937年11月9日电,116全宗68案卷。

同蒲线至太原,并以太原为主要汇集地,进一步向陕西迁移。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即有人西迁,吴宓 1937年7月28日的日记中就提及“宓谓同人多有由平绥路赴大同、太原者。苟K母女愿出京,只此一途”。平绥路难民救济专员孙显卿致赈委会的电文也多说到:“现冀察晋各战区难民来并者络绎于途。”。这些到太原的难民再经同蒲路运走,至潼关转车,他们“多去西安,去豫鲁者少数”。又有一些难民是经平绥线西至包头的,“以九月杪平绥路难民络绎逃包,现在五百余人”。值得一提的是,经平绥路迁徙的难民以学生与低级公务员居多,如住在太原难民收容所的200余人中,“多为学生与低级公务员”。

(三)一部分有能力自动南迁京沪或武汉三镇的难民,其路线与清华教授吴宓、陈达等人的南行路线大体一致。据《吴宓日记》来看,吴宓的路线比较复杂:首先由北平乘火车至天津,然后经海路至青岛,再由胶济路到济南,转津浦路到徐州换陇海路车至郑州,再从郑州转平汉路到汉口,由汉口去往长沙的联大就职。有些欲到南京、上海等地的就可在徐州接着乘津浦路车南下。与吴宓多走陆路不同,陈达主要是走水路,从天津搭海船直接到上海,再由上海溯江而上,辗转到达长沙。这两人的身份自然不同于一般难民,但他们的南行路线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吴宓日记》第6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0页。

孙显卿1937年10月9日致赈委会电,116全宗69案卷。

平绥路难民救济专员孙显卿呈赈委会报告第二号,1937年10月2日,116全宗69案卷。

孙显卿呈赈委会报告第四号,1937年10月26日,116全宗69案卷。

孙显卿呈赈委会报告第四号,1937年10月26日,116全宗69案卷。

见吴宓1937年11月7—19日的日记。

陈达:《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61—164页。

除以上三种途径外,当然还有近距离的迁移。如平绥路战事紧张时,昌平、南口、宣化及卢沟桥一带的难民纷纷逃往北平市;天津的租界也接纳了为数众多的难民,“邻近乡村的殷富住户竞相来避难”,以致人满为患。另外还有些战事进行地区的贫苦农民,为躲避战火往附近地区作暂时的流动,其具体情况就比较复杂而不易于解了。总之,这些虽也是战时人口迁移的一部分,但由于他们有的并未向后方迁移,有的则最终汇入经以上三种路径之一向后方运动的潮流之中,所以在此并不作单独列举。

华东区以上海为中心地区的难民,主要分三路迁往后方。

(一)北上至苏北等地。淞沪战事发生后,上海、昆山、嘉兴、常熟等地的难民就或乘火车,或搭轮船帆船,或徒步去往吴县,自吴县经京沪铁路,或者从水路经运河北上,至镇江后渡江到江都,然后从江都转输往苏北的高邮、宝应、兴化、泰县(今泰州)、东台、淮安、淮阴、涟水、泗阳等地。使这些地方难民麇集,均在万人以上。据统计:“自八月十三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由淞沪宝山一带经京沪路各站辗转以轮船遣送至江北江都、仪征、高邮、宝应、淮安、淮阴、涟水、泗阳、宿迁、泰县、东台、兴化、盐城、阜宁十四县者为二十五万三千九百六十五人;自动奔走或搭雇帆船,连同转道津浦路由浦口渡江至江北六合、江浦、铜山、丰县、邳县、萧县、砀山、东海、灌云等县者为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人,男妇老弱并计其二十九万九千三百二十六人。”这一北迁的势头到十月份仍是有增无减。

(二)沿沪杭甬线南迁,有的再转浙赣铁路去往南昌等地。经此路线者,主要是原籍浙赣等地的旅沪人口,因避难而回乡。

杨名声 1937 年 10 月致赈委会电, 116 全宗 69 案卷。

陈达:《浪迹十年》,第 162 页。

京沪路难民救济专员成静生致赈委会 9、10 月份的电文, 116 全宗 65 案卷。

“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朱慈鉴此次淞沪之战难民避难至松者万千成群络绎不绝……爰于本月寒日(按:即14日——引者)起在城厢内外设立难民收容所六处尽量收容迄今已有八千余人。”

“查迩来浦东吴淞一带灾民来松避难欲回浙杭者更见众多。”

“嘉兴方面……总计过境难民八万五千余人,大部分由沪杭苏嘉两路遣送,次雇专轮带拖轮运吴县等处,至湖州难民由湖嘉汽车通源轮局代为输送……宁波方面……难民过境者达八万余人。”

“凡自沪杭逃来难民皆乘浙赣车迳赴南昌。”

(三)沿江西上。这条线路在上海陷落后尤其繁忙,京沪一带人士与从北方南下京沪地区的人士多经此路内迁。陈达11月19日自上海到达南通时,与他同日到的“共四轮,约七千余人”;而与他同日到汉口的轮船,“俱由上海或南京上驶,共载旅客及难民一万余人,据说一星期来每日如此”。

在难民迁徙后方的同时,上海租界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难民。华北战事发生时,平津地区就有不少难民南下,到淞沪战事起,沪郊及沪宁、沪杭沿线的难民纷纷涌向租界,“仅‘八·一三’这天,就有难民六万余人涌入租界”。租界当局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收容,另一方面就将其中山东、苏北、浙江等地的近地难民遣送回籍,使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松江县分会 1937年8月21日电,116全宗65案卷。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松江县分会 1937年9月4日致赈委会电。

兼沪杭甬浙赣路难民救济专员钱澄 1937年9月30日致南京赈委会电,116全宗66案卷。

钱澄 1937年10月致赈委会电,116全宗66案卷。

陈达:《浪迹十年》,第162、163页。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他们加入往苏北、浙赣方向的难民迁徙潮中。另有一些有能力的富裕难民则自发踏上西迁之路。

三

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沦陷了，自此直至1938年11月12日武汉会战结束，构成了抗战初期难民内迁的第二个阶段。

在此阶段，难民内迁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规模更大了，更多的人加入了长途跋涉的行列。正如刘敬坤所指出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及南京会战，两地均有大量的人口西迁，但这种西迁还限于社会的上层，尚未触及到社会的中下层。大量难民的西迁，是在南京失守之后。”其二，逐渐从无序中凸现有序。尽管迁徙的路线仍很繁多，但西迁无疑还是成了难民内迁的主流。武汉成为此期内迁难民的主要集中地，以它为中心，内迁的难民再往湘鄂赣川陕云贵粤桂等后方地区疏散，“从完整的意义上讲，1938年的武汉是我国由立国东部沿海，转移到立国西部山区进行长期抗战的中转轴。”

难民内迁在第二阶段所以形成这样的特点，主要是日本扩大其野蛮侵略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长期抗战的态势已渐趋明朗，战略后方业已形成，中国政府相应加强了难民振济救援工作的力度。

日军的血腥屠杀造成中下层人民的大量西迁，这一因素在安徽、江苏两省难民的西迁中影响尤为突出。1937年11月日军攻陷

刘敬坤：《抗战史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课题——我国抗战时人口西迁与难民问题》，《民国春秋》1995年第4期。

上海后,在华东战场上就开始执行了野蛮的、几乎是种族灭绝的政策。这是因为华东是国民政府所在地,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战备工作较之华北要细致充分得多,不似华北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摩擦就一直存在,因而战争爆发后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在华东战场上,上海抗战是有组织进行的主动出击,日军从上海往南京的进攻途中,也一路都受到强有力的抵抗,所以军队损失较之在华北要大得多。这一地区民间的抗日宣传工作也已比较深入,据参与侵华的日本老兵东史郎的日记记载:“进入中支那以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墙上到处都写着抗日宣传文字,这在北支那很少看到。由此可见,这里抗日训练何等坚决,老百姓抗日热情何等高涨。大家议论说:中支那的抗日思想何等坚决,对他们不能手软,想杀就杀,想抢就抢!”而华北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不能如此擅自烧杀抢掠。为报复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努力,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思想,同时也为了防止受到隐蔽的抗日分子的袭击,秉着“想杀就杀,想抢就抢”的“原则”,日军在进攻南京途中,就往往执行了屠村的政策。这正如东史郎记载:“我们每当宿营时,都是首先扫荡村子,杀掉农民,然后睡觉。农民们之死可以保障我们睡眠的安全。”就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仅仅为了天亮之前平安地睡上三个小时而让许多农民去死,这也是战场上的一大悲惨情景”。南京沦陷后,拥塞了扬子江的肿黑发胀的中国人的尸体,无疑使这种野蛮杀戮的恐怖气氛达到了顶点。因此,在逃难到西南后方的难民中,皖苏两省籍的人民占有很大比例,是可以了解的:这两个省份既临近南京,又都在南京会战及以后的战事中沦为战区。

第二阶段的难民内迁中,国民政府的正面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东史郎日记》,第157页。

首先,国民政府西迁坚定了全国人民长期抗战的决心,带动了大量人口,尤其是来自于社会上层人口的西迁。早在南京陷落之前,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发表了迁都重庆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月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抗战。”政府机关分别向西迁移,不仅本身就有一部分人要随之迁移,同时也使那些长期跟随政府的社会上层人士西迁。而且,政府西迁的举措,被很多人看作是抗战到底的有力说明。战争的长期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以前幻想战争很快能结束的人,不得不直面这一事实,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其中一部分就走上举家外迁至后方的道路。

虽然国民政府已宣告迁都,但除国府五院直接迁至重庆,和交通部迁到了长沙外,外交部和财政部,以及卫生署,则迁到了汉口。以蒋介石为首、在当时地位最为显要的军事机关也于南京沦陷前迁往武昌。与此同时,由上海、江苏等东南地区内迁的工厂也聚拢到武汉三镇,这就使武汉成为实际上的军政、经济中心,吸引了大量难民的前往。

国民政府对于此阶段难民内迁的积极作用,还集中来自于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加强了难民救济工作,通过其下属的难民救济机关直接干预了难民内迁运动。随着南京沦陷后难民数量的不断增加,难民问题日益成为切关时局的紧要问题之一。为免这些众多的人口羁留在敌占区,加强难民救济工作自然提上日程。国民政府首先调整了救济难民的机构,1938年4月,在行政院赈务委员会和1937年9月成立的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

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410页。

史良:《政府机关“西迁”是“抗战到底”的有力说明》,《救亡日报》1937年11月20日第2版。

隶属行政院的振济委员会,作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救济难民的最高领导机构。新的振委会分各省市县振济会、各救济区、各运送配置难民总站三个系统对难民进行救济,其中在难民内迁过程中作用尤其显著的是运送配置难民总站及其下设各分站和难民招待所的工作。运送配置难民总站一般设在交通要冲等难民迁徙的必经之地,管辖一定的区域和路线,其任务就是帮助解决难民内迁过程中的饮食、医疗、交通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国民政府的振济工作仍很有限,但很显然,如果没有这些来自政府的帮助,广大的难民,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窘的、来自社会中下层的难民,他们的内迁将更加艰难,或者甚至就成为不可能。

除救济及协助难民内迁外,国民政府还通过疏散遣送人口及鼓励难民垦荒等方式,为难民内迁规定出一定的方向,从而使头绪纷杂的难民内迁运动显出些有组织性。

随着战线由东南沿海和华北不断向内地推移,“后方”的概念也随之不断收缩,直至主要包括西部省份。广大难民要向后方迁移,则自然地多踏上西迁之途,这是第二阶段难民内迁主要特点形成的一个必然的客观因素。

在第二阶段,近距离的迁徙情况仍大量存在,如日军攻陷豫皖边境后,两省民众多向大别山脉一带逃难,使那一地区“麇集难民不下十余万”。不过,此时期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大量的难民踏上往西南、西北的长途之旅。

下面将分南方战区和北方战区来讨论第二阶段难民内迁的具体情况。当然,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南方和北方,仅仅是为了一种区分和表述的方便。

孙艳魁:《苦难的人流》,第158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116全宗274案卷。

南方苏皖浙赣鄂东等地的难民一般都是先往武汉运动,然后分散至西南各地,武汉成为难民内迁重要的中转站。他们有的沿长江由水路至武汉。这条路线在上海陷落后,即已非常繁忙,京沪等地难民及从华北平津二市南迁京沪的难民,多继续由此线内迁。到南京沦陷后,战线西移,“长江一带难民纷纷逃集武汉”,经此路西迁者更见拥挤。另外,皖东北及江苏、上海等地的一部分难民由陆路转道河南南部去汉口。他们先从安徽六安经公路到河南的固始、商城,由此经潢川到信阳,再由信阳乘平汉路火车去汉口。但这条线路到1938年6月份后有所变动,因为“到达信阳车站的难民太多,而且日机每天飞临信阳车站上空投弹扫射。潢川的难民登记站严禁难民由潢川西行(罗山难民登记站不接受难民登记),限令难民们由潢川南行,经光山、经扶(今新县)至湖北宋埠、黄陂抵达汉口”。

这些难民到达武汉后,一般都稍作停留就继续内迁,尤其当战事日益逼近武汉时,政府也下令疏散人口。于是,以武汉为中心,大量难民再向后方各省疏散。其具体方向大概有二:一是继续沿江上驶,或乘船,或从陆路乘车,有的甚至步行,经沙市、宜昌去往重庆和四川省其他地区,这是当时最繁忙、集中难民人数最多的一条西迁之路;二是经粤汉铁路或者武长公路至长沙,由长沙一部分安置在湘西,如湘西沅陵等9县就被作为安置皖籍难民区,有的则继续由粤汉铁路或公路南下株洲、衡阳,再从衡阳转道湘桂铁路或公路去往广西桂林、柳州,以及更远的贵阳。

除转道武汉外,南方难民的内迁道路还有这几种:一,安徽中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116全宗940案卷。

刘敬坤:《抗战史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116全宗274案卷。

部的难民从安徽的宿松经九江、南昌去往赣南；二，从上海经海路或陆路到温州、金华，由金华经浙赣铁路或到赣南，或去往株洲，自株洲加入内迁广西、贵州的路线；三，1937年4月，南京至昆明公路线开放，到南京失陷后，有一部分难民就可以沿公路自江西或安徽直至云南。

除西迁外，“有些人又从上海起程，再向华南移动，或是到香港或是到广州。”

北方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难民，其西迁情况较之南方难民要相对简单一些。他们中有一部分沿平汉线南下武汉，加入内迁西南的人流。而其主要的迁移路线则是循陇海线，经郑州、洛阳，出潼关，至西安、宝鸡、汉中等地，有的并进一步转入甘肃、四川省境；还有一条路线是晋北的难民从绥德经军渡进入陕北安置。

总之，这一阶段，南方难民主要往西南，北方难民主要往西北迁徙，构成难民内迁的总体西迁趋势。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任何阶层的任何人都难逃战争对其命运的强制安排，众多的人口被战火逼离家园，沦为难民，踏上内迁之路。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经历了从无序渐趋有序的两个阶段的过程。在第一阶段，由于战争骤然爆发，战区人们仓促应变，为躲避战祸四处奔逃，一些临近战区的临时“后方”成为难民的避难地；难民迁徙的路径表现出头绪繁多，缺乏较为清晰的主线的特点。到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的1938年，因为战区不断扩大，更多的人口被抛入内迁的难民潮，但随着战线内推，后方的概念相对收

陈达：《现代中国人口》，第93页。

陈达：《现代中国人口》，第91页。

第二阶段的难民内迁路线，除特别注明的外，主要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第117全宗4案卷“振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各总站管理路线一览表”（1938年8月制），并参考了孙艳魁《苦难的人流》中的有关论述。

缩,并随战争将进入相持状态而日趋明确,最后主要包括了西南、西北的几个省份;同时,国民政府表示了长期抗战的决心,不仅是抗战工作,对于难民的救济与疏导工作也较之第一阶段更为得力了,从而使“后方”概念不仅在地理上,也在人们的心理上明确起来。因此此期的内迁难民基本上都选择了向西迁徙的道路,跟随政府涌入以四川为中心的战时大后方。他们的内迁,就个体来说是艰难困苦的过程,但从国家、民族的利益来说,是向后方积聚了必要的人力资源。这些内迁到后方的难民,在其后的抗战岁月中,为支持抗战事业、争取民族独立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程朝云,1975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兵)